



安徽師範大學
傳媒與藝術學院



北京師範大學出版集團
安徽大學出版社

徽州水利社会研究

——以新安江流域为中心

孟凡胜◎著



安徽師範大學出版社
蕪湖新華書畫

徽州水利社会研究

——以新安江流域为中心

孟凡胜◎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安徽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徽州水利社会研究:以新安江流域为中心/孟凡胜著. —合肥 : 安徽大学出版社, 2017. 1

(安徽大学徽文化传承与创新丛书)

ISBN 978 - 7 - 5664 - 1033 - 7

I. ①徽… II. ①孟… III. ①水利史—徽州地区 ②社会史—徽州地区 IV.
①TV—092②K295. 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70194 号

徽州水利社会研究——以新安江流域为中心

HuiZhou ShuiLi SheHui YanJiu——Yi XinAnJiang LiuYu Wei ZhongXin

孟凡胜 著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安徽大学出版社
(安徽省合肥市肥西路 3 号 邮编 230039)
www.bnupg.com.cn
www.ahupress.com.cn

印 刷: 合肥远东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70mm×240mm
印 张: 15
字 数: 214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9.00 元
ISBN 978 - 7 - 5664 - 1033 - 7

策划编辑: 鲍家全

装帧设计: 李军 金伶智

责任编辑: 鲍家全 胡旋

美术编辑: 李军

责任校对: 程中业

责任印制: 陈如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551—65106311

外埠邮购电话: 0551—65107716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551—65106311

前言

QIANYAN

- 徽州是中国传统社会后期的典型区域,各领域的杰出之士,代不乏人,尤其是遗存的文献和实物众多,极具“标本”意义。在徽州以至在整个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水利都占有极其独特而重要的地位。本书试图将徽州和水利联系起来,通过考察徽州独特的人文社会环境因素与以水为代表的自然环境因素的碰撞纠合过程,探求徽州水利社会的发展变迁及其背后的利弊得失。
- 本书研究的地理范围主要是徽州的新安江流域。新安江一水东流,集束了徽州最大盆地内的诸条水系,形成了一条极为重要的内外联系通道,人流、物流和信息流通过这一通道实现了交换。新安江流域作为徽州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和地理等方面的核心区域,在徽州历史发展变迁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这历史的长河中,徽州人逐水而居,围绕着诸种水利趋利避害,不断调适,因应作出了不同的选择,包括传统的渔、樵、耕、读四种生产和生活方式。其中,渔、樵、耕与水利密切相关,读则跃然而出,缠绕其间,最终错综集成徽州历史上极具特点的“隐士”文化。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徽州众多的“隐士”,走出徽州,与水产生了更多的社会联系,小徽州与大徽州的“隐士”们内外连接,上下互动,共同促进,形成了波澜壮阔的徽州水利社会。



- 关于水利社会的研究,以山西、陕西为代表的中国北方地区干旱少雨,饮水和灌溉等水利问题一直以来受到重视和关注。就南方而言,农业灌溉问题虽然是研究热点,但是,因为降雨量相对丰沛,南方地区水利社会研究的范围便更为广阔,如渔业、航运等水利问题,特别是航运水利更为重要。就徽州而言,本地士绅在以吕堨为代表的水利灌溉工程中,通过对偶像的塑造和祭祀,不断宣示和强化创建者家族的特殊贡献和利益。虽然其地位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消解,但是,对于作为发起人和倡议者的士绅家族,其所发挥的建设性作用理应予以肯定。
- 对于徽州社会而言,航运的作用特别重要,尤其是在南宋迁都杭州以后,徽州实现了从僻野荒陬向京畿之地的跃迁,特别是通过新安江水路,徽州与首善之区的经济距离较之地理距离更为缩短,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互动大为增强。通过新安江水路等通道,背井离乡、走出大山的徽州人日渐增多。一方面是因为本地人口增长和粮食不足之压力,另一方面也是行者倍利、居者屡空之事实,逐水而行源于利益的驱动。这些人中徽商赫赫有名。
- 伴随着徽州商业的日渐兴盛,渔梁、屯溪等一系列市镇多滨水而建,因水利而兴。它们大都位于徽州的一些水路要道上,作为徽州商品与人员集散的大小中心节点而逐渐兴盛起来。徽州人曾经走在海洋时代的前沿,在16世纪的中国东南沿海上,于倭寇之乱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人物中,不少人的籍贯恰为徽州,这其实正反映了徽州商业触角的延伸程度——既广且深。但是,徽州同整个中国一般,从海洋内敛而后退了一步,转向内陆河流,也因此失去了发展先机,最终繁华褪尽,黯然落幕。

目录

MULU

前 言	1
绪 论	1
第一节 选题缘起及意义	1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2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主要内容	16
第一章 徽州的历史地理与发展变迁	18
第一节 徽州的历史沿革和山水地理	19
一、徽州的历史沿革	19
二、徽州的山水地理	22
第二节 徽州的历史与经济	29
一、徽州的历史与经济	29
二、徽州的发展	36
第二章 逐水而居：徽州的渔樵耕读与“隐士”生活	42
第一节 桃花流水鳜鱼肥：徽州渔业的历史	43



第二节 徽州的“樵夫”和外地的“樵夫”	53
第三节 耕在“水穷处”	65
一、地窄人稠水利先：徽州的水利灌溉设施	66
二、灌溉恃塘还恃堨：从《吕堨记》开始说起	87
第四节 思乐“泮水”：乡居读书与徽州的“隐士”	100
第三章 徽州的跃迁与水路航运	108
第一节 南宋迁都临安与徽州的跃迁	108
第二节 行者倍利：商人与徽州的水路航运	123
第四章 渔梁坝与徽州的市镇	145
第一节 渔梁坝的历史演变	146
第二节 渔梁坝的水利作用	160
第三节 因坝成市为渔梁	164
第四节 滨水而兴是屯溪	174
余 论：成败由水——新安江的沉寂和望洋兴叹	188
参考文献	197
后 记	231

绪 论

第一节 选题缘起及意义

徽州作为中国传统社会后期的典型区域,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工艺和美术等各个领域,影响广泛而深远,其杰出之士,代不乏人。留存的大量罕见而集中的徽州文书和实物,更增其“标本”意义。在这些文献与文物遗存的基础上,徽学研究有条件言之有物,诸如徽商、徽州宗族等研究有声有色,新安理学、徽派朴学、徽州民俗、徽州戏曲、徽州科技、徽州工艺、新安医学、徽州教育等研究也蓬勃开展,成果频出。

本书尝试对徽州水利社会作一初步综合性探究。“农,天下之大本也”^①,农业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农业的第一个条件是人工灌溉”^②,水可认为是农本。中国历代统治者无不重视水利,从大禹治水开始,几千年来,欲国家殷实富强,必须勤谨修治水利。水于徽州而言,其利包含灌溉,又不止于灌溉,特别是新安江这条徽州的母亲河,就像黄河、长江之

① (汉)班固:《前汉书》,《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4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86页。

② [德]弗里德里希·冯·恩格斯:《恩格斯致马克思》,1853年6月6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263页。



于中国,给予徽州的是多方面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在徽州以至在整个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水利都占有极其独特而重要的地位,研究水利和水利社会史,从学术意义上来说,很有必要。

本书将徽州和水利联系起来,通过考察徽州独特的人文社会环境因素与以水为代表的自然环境因素的碰撞纠合过程,探求徽州水利社会的发展变迁及其背后的利弊得失。时间范围上主要是南宋以降特别是明清时期,地理范围主要以新安江流域为中心。

徽州本以山越蛮荒之地著称,南宋后竟一变而为“东南邹鲁”^①,“聚族成村到处同,尊卑有序见淳风”^②;徽州宗族制度,宋元以来,典型完备,特别发达。徽商煊赫辉煌延续几百年,足迹几遍天下。在这七八百年的时间里,徽州其兴也勃焉,其衰也忽焉。为何出现这种情况?徽州的比较优势与劣势是什么?徽州兴起与衰弱的原因何在,是否与水利有所关联?

本书试图利用徽州的相关文献,包括正史、地方志、诗词、碑文、家谱、文书、民谣、传说等材料,以窥徽州水利社会之一斑,通过对这一区域水利社会史进行的考察,了解历史上徽州地区水利环境和人类社会生产、生活活动的相互影响和作用,以及由此带来的兴衰变迁。从现实意义上来说,希望通过这个研究为今后人们认识环境、改造世界提供历史的借鉴。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在和平环境下初始的地理环境对于文化与文明特质的萌生具有重大影响。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各区域不同的自然环境的差异导致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具有不同的风俗人情。且不说不同的地理环境形成了中华文明偏大陆

^① (元)赵汸:《商山学院学田记》,《东山存稿》,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87页。

^② (清)吴梅颠撰,胡益民点校:《徽城竹枝词》,见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编:《徽学》,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80页。

性与希腊文明偏海洋性的不同，单就中国而言，“龙生九子，各有不同”，无论是《尚书·禹贡》，还是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都生动地描述了九州各异的情形。

然而，无论南方北方、东部西部，都共同面对着一个“水”的问题。水不羈于物、无拘无束的特性，使得“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加之季节的变化、气候的差别，造成了地区之间的水量分布极不均衡。《老子》言：“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然资源有限，水量有多有少，因此，水虽不争人却争。水是生命之源，涵养孕育了万千生灵，人自诩为生灵之贵者，为了更好地生存，趋利避害，长久以来就试图驯束水、利用水，这就在中国历史上形成了绵延悠长的水利文化。

何谓“水利”？《中国大百科全书》认为：“水利是中国的传统用词，泛指人类一切以水为对象的除害兴利活动，它的内涵随着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不断演进。”^①这说明水利在中国历久相传，与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活动有关，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含义也在不停变化，因时因地而异。战国时期《吕氏春秋·慎人》说：“舜之耕渔，其贤不肖与为天子同。其未遇时也，以其徒属，掘地财，取水利，编蒲苇，结罘网，手足胼胝不居，然后免于冻馁之患。”这是中国典籍上首次出现“水利”一词，高诱注解：“水利，灌漑。”^②如果参考前面“耕渔”一词，或亦有捕鱼之意。西汉时，《史记·河渠书》是因司马迁“从负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诗而作”。该文按时间顺序记述了从大禹治水、李冰治水、西门豹治水、郑国渠修建，到汉文帝时“河决酸枣”“大兴卒塞之”，汉武帝时“河决于瓠子”“卒塞瓠子”的历代故事，言“自是之后，用事者争言水利”。^③该文算是中国第一部水利专门史，从《河渠书》的描述来看，

^① 《中国大百科全书》编委会：《中国大百科全书》，第2版，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第560页。

^② (秦)吕不韦撰，(汉)高诱注：《吕氏春秋》，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4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80页。

^③ (汉)司马迁：《史记》，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4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656—658页。



此时的水利已有防洪、灌溉与通航之含义。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叶榆河》：“愚以行兵此道最便，盖承藉水利，用为神捷也。”^①这个水利专指水路运输之利。此后诸朝代水利不脱上文诸义。

1933年10月，在浙江杭州召开的中国水利工程学会第三届年会，对“水利”的“范围”和“定义”形成了一项“决议”：

本会为学术上之研究，水利范围应包括防洪、排水、灌溉、水力、水道、给水、污渠、港工八种工程在内，但为建议政府确定水利行政主管机关之职责起见，应采用如下之定义。

“水利为兴利除患事业，凡利用水以生利者为兴利事业，如灌溉、航运及发展水力等工程，是凡防止水为害者为除患事业，如排水、防洪、护岸等工程是。”^②

相比于古代，水利的范围有所变更。20世纪下半叶，将“水土保持、水资源保护、环境水利和水利渔业”等诸种类型纳入，水利的含义更加广泛。20世纪90年代以后，水利一词又涵盖了“可持续发展和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维护生态和环境安全的思想”。进入21世纪后，水利的含义可概括为：“人类社会为了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需要，采取各种措施，适应、保护、调配和改变自然界的水和水域的时空分布，以求在与自然和谐发展、维护生态和环境安全的前提下，合理开发利用水资源，并防治洪、涝、干旱、污染等各种灾害。”^③

可以看出，水利的概念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迁，总的的趋势是内涵不断扩大，这与人类对于自然世界的认识不断深入是相关联的。

何谓“水利社会”？在古代，水利主要可概括为以下几种：洪水滔天，防

^①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7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545页。

^② 《中国水利工程学会第三届年会大会纪录》，见《水利》(年会专号)，1933年，总第5卷第5期，第100页。

^③ 《中国大百科全书》编委会:《中国大百科全书》第2版，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第560页。

洪水利一也；引水济农，灌溉水利二也；舟行水上，航运水利三也；水车水碓，水力水利四也。除此之外，尚有渔业、饮用、排水、防火、御敌以及其他水利。简而言之，水利就是因水带来的各种利益，即使是防洪，亦是对于潜在利益损害的预防。广义地讲，水利不仅包含经济利益，也包含精神文化利益，比如通过水这一媒介，人与自然彼此互动，和谐相处，达到生理和心理上的满足状态，这种良好的身体和精神状态也是因水带来的利益之一种，堪称水利。

比如徽州地区盛行的风水之说，一定程度上来说，就是一种水利。它察于山形，观乎水势，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在尽量不破坏整体自然环境的前提下，对亭台楼阁、水土林木等人工元素进行局部调整，布设得当，内涵丰富，便利生活，达到安全与经济的动态平衡、人与自然情景交融的和谐境界。自然和人文景观交错相依，人在山水聚合中，感受到风水环境带来的优美建筑与景观空间，以及尤为重要的心理暗示和精神激励，身心愉悦，怡然自乐。

以上这些利益都与人相关。受到水系的地理限制，水利多具有区域性特征，而社会是共同生活的人们通过各种各样社会关系联合起来的集合。对于“水利社会”的定义，王铭铭在《“水利社会”的类型》一文中，认为“水利社会”指的是“以水利为中心延伸出来的区域性社会关系体系”，这个定义简明扼要地表述了水利与区域社会联盟形成的机制及相互作用的关系。^① 行龙《水利社会史研究大有可为》一文中认为“水利社会就是以水利为中心延伸出来的区域性社会关系体系，这个区域社会是以水利为核心，进而涵盖政治、经济、宗教、文化、民俗、环境、社会生活等因素的综合有机体”^②。综上所述，水利社会一般是指自然背景下利害博弈群体以诸种水利为纽带形成的区域性社会关系总和。

传统的水利史主要是国家治水史、水利工程和技术史，主要是为各个朝代的政府决策提供借鉴、技术的服务和支撑，多从宏观角度和上层视角分

^① 王铭铭：《“水利社会”的类型》，《读书》，2004年第11期，第18—23页。

^② 行龙：《水利社会史研究大有可为》，《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7月14日，第8版。



析,大而化之。随着历史学与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交叉融合,历史研究的对象与方法有所更新。不同于以往将帝王将相等上流阶层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政治史、文化史和以国家意志为主要驱动力的水利史、科技史,水利社会史将研究目光下移,关注大时代和大地理背景下的社会个体、底层群体的心态变迁、人际互动以及人与环境的彼此影响和依存的关系。这种研究一方面不再局限于单纯的国家视野而具有区域性社会特征,另一方面着眼于整体史研究而非孤立的领域,通过田野调查,走进现场,将实物、口述史料与既有的文字史料相结合,试图将各个角度的一枚枚历史切片组合模拟成历史的动态场景。

水利社会史是以水利问题为切入口,不局限于水利史研究,它通过对水利个案的考察,在水利与自然、社会形成的广泛互动背景下,联系和比较广区域和长时段水利产生、发展和影响的异同,探究隐藏在表象背后的深层社会意义。

中国水利社会史的研究起步较晚,一开始深受外国水利社会史研究特别是美、日等国家的影响。比如,英文版的冀朝鼎《中国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他在广泛搜集原始水利资料的基础上,提出了“基本经济区”的重要概念。^① 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对于集权力量的比较研究》,认为水利工程经常需要大规模的协作,这种协作促使专制君主和“东方专制主义”产生了。这一看法曾引起广泛争议,不过也促使国内学者对于水利社会有所认识和思考。^②

整体史的研究最好能够获得区域史研究的支撑,各个区域的相关研究经过考察和对比,有利于看出彼此的特色。将局部的研究综合在一起,可以更全面和深入地把握整体的规律,不然,盲人摸象,难免有所偏颇。因此,历

^① 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朱诗鳌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② [美]卡尔·A·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对于集权力量的比较研究》,徐式谷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



史的区域化研究很有必要。

森田明《清代水利与区域社会》以清代水利史为中心,分别探讨不同地域水利设施的兴废,以及不同社会阶层对水利问题的态度和举措,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中国传统农业向近代农业演变和发展的脉络。作者主要以长江中下游为研究重点,每章描写一个特定区域,涵盖华北、华东、华中地区,搜集并整理了很多罕见的方志和家谱等资料,研究规范严谨,分析细致入微,是海内外关于清代水利史研究的重要著作。^①

要对幅员辽阔、地区间环境差异明显的中国进行历史考察,加强区域史研究确有必要,尤其是对区域水利社会史的研究。

目前中国水利社会史研究已体现了区域化特色,比如,就重点研究区域而言,主要有两个分布带:首先是西北、华北等北方地区,如甘、陕、晋、冀、豫等省,黄河于其中蜿蜒曲折,形状类似一个正“几”字;其次是东南沿海及长江流域等南方地区,如川、鄂、苏、闽、粤等省,长江一线与东南沿海海岸线交汇于上海,形状类似一个斜“几”字。两个“几”字形地带,水利社会各具特点,其中北方山陕地区、南方江南地区是研究热点区域。国内其他地区水利社会史的研究有的已逐渐展开,但总体而言仍相对薄弱。

以北方山陕地区水利社会研究为例,这一地区相对于南方来说,雨量较少,水资源稀缺,因此水利问题一直受到人们的重视,留存了大量关于灌溉、饮用的文献材料。之前研究者多“目光向上”,甚少关注这些材料。直到一些西方学者基于西方历史研究的传统,将目光投向这些地区,经过实地田野考察和对文献资料挖掘整理之后,这些极有价值的材料才走出“独守春闺无人知”的尴尬境地。

不少国内学者对西方史学理论悉心体味,辩证借鉴,其学术方法和视角较之以往更加丰富和广阔,收获了丰硕的学术果实。北京师范大学赵世瑜《分水之争:公共资源与乡土社会的权力和象征——以明清山西汾水流域的

^① [日]森田明:《清代水利与区域社会》,雷国山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



若干案例为中心》一文认为,民间故事本身就是历史过程的一部分,成为表现某种权力关系的象征性资源。比如数百年来广泛流传于晋中、晋南地区的许多“分水”传说,反映了水资源利用这一重要问题与区域地理、社会制度与国家制度、社群关系等有密切关联。作者并没有把分水问题看作简单的人口—资源关系紧张的结果,而是将其放在公共资源或公共物品产权界定的问题框架中去思考和分析。该文通过分析明清山西汾水流域的太原晋祠等若干个案,试图显示乡土社会内部错综复杂的权力关系,以及为协调这一关系而逐步确立和完善的制衡性制度。^①

山西大学行龙教授及其研究团队较早开始研究山西水利社会,学术成果丰厚独特。行龙《“水利社会史”探源——兼论以水为中心的山西社会》一文主张山西水利社会史的研究主要从四个方面展开:首先是对水资源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其变化进行全面分析,并以此作为划分类型和时段的基本依据。从类型学角度出发,将河流、泉水、山洪、湖水四种水源形态对应的区域社会初步称作“流域社会”“泉域社会”“洪灌社会”“湖域社会”,并以此作为分析工具,进一步开展“水利社会”史研究。第二,是对以水为中心形成的社会经济产业的研究。第三,是以水利案例为中心,对区域社会的权力结构及其运作、社会组织结构及其运作、制度环境及其功能等问题开展系统研究。第四,是对以水为中心形成的地域色彩极浓厚的传说、信仰、风俗文化等社会日常生活的研究。上述四个方面,构成了以水为中心的山西乡村社会研究的主要内容,也是作者从实证出发研究水利社会史时所遵循的一条基本路径。^②

对于陕西关中地区水利社会史的研究,厦门大学钞晓鸿《灌溉、环境与水利共同体——基于清代关中中部的分析》一文对森田明等日本学者将水

^① 赵世瑜:《分水之争:公共资源与乡土社会的权力和象征——以明清山西汾水流域的若干案例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第189—203页。

^② 行龙:《“水利社会史”探源——兼论以水为中心的山西社会》,《山西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第33—38页。



利共同体解体的根本原因解释为明末清初的地权集中的观点进行了反思，通过实证分析，认为探求关中水利共同体解体的根本原因，必须结合自然、技术、社会环境来分析。技术条件与环境的变化导致引水秩序很难保持稳定和平衡，渠民的权利和义务不能对等，这使得水利共同体无法持续。^①

上文所述是以山陕地区为代表的中国北方地区水利社会史研究的简要回顾。总体上说，这一地区，相对于南方而言，干旱少雨，饮用和灌溉用水问题一直以来更受到重视和关注。特别是在一些典型地区，有限的水资源如何作相对公平的有效分配，成为影响极为深远的问题。水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布不均，影响到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这些地区，在追求共同利益的诉求下，传说与偶像重新得到了塑造，并不断强化，百姓的信仰和民间的风俗习惯随之变化，血缘、地缘、神缘等组织相互交织，族权、政权与神权在若即若离的过程中共同展现权威，国家控制和地方管理体系进一步稳固，新的社会秩序得到了建立，这一切大都是因为发展了水利。水利问题水银泻地般渗透进社会的运行过程中，若隐若现。

北方自然环境的特异性影响到了个人的选择，每个成员的选择集合成社会举措，形成社会力量，又反过来影响个人选择与自然环境。这个过程中，围绕着水利问题，不同利益群体之间互动博弈，北方地区形成了独特的水利社会景象，水利社会史研究也以此为前提展开。

下面是南方地区。

对于东南沿海，厦门大学郑振满在《明清福建沿海农田水利制度与乡族组织》一文中指出，历史上的农田水利制度，不仅反映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也反映了农业生产过程的组织形式。明清福建沿海水利组织有“官办”和“民办”两种形式。大型水利设施多“官办”，小型水利设施多由民间宗族修筑管理。地方官府财政费用不足，水利设施管理有从“官办”向“民办”过渡的趋势。从某种意义上，这“说明了明清时期政府的作用不断削弱，而

^① 钱晓鸿：《灌溉、环境与水利共同体——基于清代关中中部的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第190—204页。



乡族组织的势力却日夜壮大”。^①

对于长江流域,武汉大学杨国安《樊口闸坝之争:晚清水利工程中的利益纷争与地方秩序》一文,记录了湖北武昌县樊口地区,就是否修建樊口闸坝,爆发过一场旷日持久的水利冲突。当地民众双方就水利工程涉及的农业、渔业、商业、航运、水利安全等诸多领域展开争论。这一事件,体现了晚清地方利益群体之间的博弈关系,以及国家与民众有关大型水利工程的决策机制问题。^②

复旦大学肖启荣博士学位论文《明清时期汉水中下游的水利与社会》认为从明中后期到民国,汉水下游南北两岸的州县,因为水利环境的变化以及水利治理的政策,围绕三个分水穴口进行了长期水利纷争。水利纷争控制权经历了由官绅与上层绅士向下层绅士与民众转移的过程,解决纷争途径由官僚集团内部协商走向暴力的自治行动。^③

翟婷、胡理在《明清时期汉江中下游地区的水利建设与社会关系》一文中认为,明清时期汉江中下游河道变迁,对沿江区域造成极大危害。人口压力的加大,使得这一地区水利建设迅速发展。文章对汉江水利建设进行了描述,从水利社会史的角度,对汉江中下游水利建设中反映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士绅作用、商人实力加强等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④

此外,关于四川盆地,四川大学谢继华硕士学位论文《民国时期都江堰灌区水费及水利纷争研究》认为,都江堰水利工程的维修离不开水费征收,都江堰灌区的管理经费也与征收水费息息相关。^⑤

① 郑振满:《明清福建沿海农田水利制度与乡族组织》,《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4期,第38—45页。

② 杨国安:《樊口闸坝之争:晚清水利工程中的利益纷争与地方秩序》,《中国农史》,2011年第3期,第111—120页。

③ 肖启荣:《明清时期汉水中下游的水利与社会》,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

④ 翟婷、胡理:《明清时期汉江中下游地区的水利建设与社会关系》,《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第131—134页。

⑤ 谢继华:《民国时期都江堰灌区水费及水利纷争研究》,四川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